

被遺忘的「大路」

——香港大專學生社會服務隊發展軌跡初探

林愷欣

香港大學饒宗頤學術館

一、前言¹

香港地區研究自上世紀 50 年代起，無論在研究課題和方法上，均起了顯著和重要的變化，不少西方與日本等地學者相繼來港進行調查研究，其中新界傳統鄉村社會之宗族體系、宗教信仰與民俗文化等範疇，更是學者們尤感興趣的課題。香港獨特的地緣和政治等因素，促使其成為海外學者了解中國的一道便門，而新界鄉村地區亦成為學者窺探中國傳統社會文化的一個自由空間。

此時期，人類學開始在香港發展，當中的文化人類學——透過參與觀察形式搜集資料的田野研究方法，較受香港學界重視。²最早到香港進行研究的有社會人類學家華德英 (Barbara E. Ward)，其後英

國、美國等地的西方和日本學者陸續來港進行研究，有關的研究著重實地考察調查，涉及地域以新界鄉村地區為主，當中亦有針對城市發展的研究，課題包括宗族，以及漁民、客家人等族群社會，還有經濟、宗教、傳統節慶及風水信仰等方面。本地學者羅香林教授在 60 年代亦開始在新界地區收集族譜；在 70 代末至 80 年代初，科大衛、陸鴻基和吳倫霓霞三位學者在新界展開了廣泛的田野調查，搜集了大量珍貴的碑刻、契約和口述歷史資料，及後科氏等更結合歷史學與人類學的方法，在新界地區進行口述歷史研究。³皇家亞洲學會香港分會自 1959 年恢復後，該會一班熱衷香港史地文化研究的專家學者，亦常就有關課題於該會年刊發表

1 本文在筆者的碩士論文《學生運動與社會改革：1963-1973年間香港大專學生社會服務隊研究》的基礎上發展而成，非常感謝諸位前輩的教導與鼓勵，以及鄒天賜先生、林鼎彝先生、胡秀珊女士、歐陽湛可先生提供的照片，還有多位「服務隊」隊員和受訪者所提供的資料。筆者於 5 年前加入「華南研究會」，獲益良多。本年適逢「華南研究會」成立 20 周年，同時亦是「服務隊」成立 45 周年，謹撰此文，以茲紀念。

2 廖迪生，〈文化人類學與華南研究〉，華南研究會編《學步與超越：華南研究會論文集》(香港：文化創造出版社，2004 年 3 月)，頁 41。

3 參見科大衛，〈告別華南研究〉，華南研究會編《學步與超越：華南研究會論文集》(香港：文化創造出版社，2004 年)，頁 11-16。



文章。在 80 年代以後，以人類學、歷史學、社會學等方法進行的新界地區研究，已見一番成果，並對日後新界地區，以至香港史研究的整體發展，有著深遠的影響。

學界對新界地區研究的關注面廣泛，然而，有關研究多以鄉村、族群或個別的研究專題作本位，重點集中於探討研究主體的結構，以及其歷史和文化本質；對於鄉村與城市社會的關係，研究視角多自外而內，著重探究外界或周邊環境對新界鄉村社會的影響，例如城市發展對鄉村的衝擊等，鮮有研究論及新界鄉村與城市社會雙向的影響與作用。

1960年代，香港已漸從第二次世界大戰恢復起來，社會無論在民生、教育、經濟等方面均漸次發展，新界鄉村亦隨着新市鎮的發展而逐漸轉變。與此同時，中國的社會改革、文化大革命、世界性的學生運動等等，又為香港帶來政治與思潮的衝擊，例如 1966、67 年間發生的社會騷動事件，以及 60 年代末至 70 年代初的學生運動，與當時社會所受到的影響與衝擊，有着密切的關係。正如香港史學者洗玉儀所述：「歷史中永遠存在兩種轉變，一是漸變，另一是劇變。六十年代的時候，這兩種變化都存在。」⁴ 1963 年成立的「香港大專學生社會服務隊」，正體現了香港大

專學界在 60 年代的變化與發展。

香港大專學生社會服務隊（下稱「服務隊」），乃首個聯校的大專服務團體。「服務隊」組織嚴謹，強調體力勞動的服務精神，以及關注國家民族與社會問題的意識，在當時的學生組織中別樹一幟。該組織主要的活動是通過舉辦工作營，為窮鄉僻壤的村民修橋築路，以勞動服務社會，又辦有刊物《大路》和《服務歌集》等等，後設有文化工作隊，將圖書、電影、音樂帶到鄉村，此外，該隊還有組織及參與其他社會服務和運動。從 1963 年 12 月創立至 1973 年 1 月解散 9 年間，「服務隊」曾走進 50 多個鄉村，參加活動者逾千人，所修建之橋樑、堤壩或水泥路不少尚存於田野鄉間；然而，「服務隊」的歷史早已被遺忘，除了零星資料見載於香港學生運動發展之刊物外，該隊的資料未被學界認識和重視。為此，筆者在 2003 年至 2004 年間，曾搜集及整理「服務隊」的文字和圖片資料，此外，先後訪問了 25 位隊員，另聯繫了近 50 位隊員及曾參加該隊活動的人士，以收集相關的口述歷史資料，並進行實地考察，完成了碩士論文《學生運動與社會改革：1963 至 1973 年間香港大專學生社會服務隊研究》，以及〈香港學運的「勞動」篇——記「香港大專

⁴ 洗玉儀，〈六十年代——歷史概覽〉，田邁修、顏淑芬編《香港六十年代：身份、文化認同與設計》（香港：香港藝術中心出版，1995年），頁 80-82。

學生社會服務隊」一文，⁵以「服務隊」為中心，初步重構這個被遺忘的組織的歷史面貌。本文將以有關研究為基礎，目的是從該隊的歷史與組織，探討其發展模式、在城鄉之間的存在意義，以及在香港社會文化史中的研究價值。

二、難民潮與西貢坳的千呎山路 ——「服務隊」從萌芽到成立

香港大專學生社會服務隊的成立，建基於60年代初期大專學生社會意識的覺醒。1962年香港出現了一次前所未有的難民潮，根據《香港年報》資料所述，在該年4月至5月期間，短短六星期內有超過62,400人從陸路偷渡來港。⁶香港政府竭力制止難民潮的同時，不少香港居民同情難民的遭遇及慘況，向難民伸出援手。靠近邊境的村民組織起來，阻攔遣返難民到羅湖的車輛，亦有人為難民送上食物及衣服。由於當時香港政府實行抵壘政策，部分市民協助難民喬裝出市區，一些大專

學生亦有參與其中。崇基學院的工友和同學給予難民飲食、修髮、換衣，並協助帶難民到達市區，以及為他們聯絡親友。⁷1962年5月18日，崇基學院同學展開籌款救濟工作，一天內募集了近三千元，後將大批糧食和藥物送到邊境，待由軍警派予難民；部分同學更組織起來，與劫持和勒索難民的蛇頭⁸交涉，親身救助難民。⁹崇基學生積極參與救助，漸現大專學生同情與關懷社會的行動。隨後，部分學生又參與了1963年大觀村徙置事件，並成為了創辦「服務隊」的重要成員。

1963年9月，政府下令清拆在九龍鑽石山大觀新村的寮屋區，並要求居民遷往西貢坳七號墳場舊址作臨時安置；該處為一山坡，並沒有道路連接山下，食水供應不敷，政府所派的水車亦供不應求。這次遷徙事件引起社會各界人士關注，大專學界對大觀新村徙置西貢坳的境遇深表同情，並將關懷付諸行動。當時先有熱心的同學組織到西貢坳實地調查，並聯絡葉錫恩議員，嘗試策劃行動幫助居民；¹⁰繼而

5 見《香港大專學生社會服務隊四十周年特刊》(香港：香港大專學生社會服務隊，2004)，頁46-52。

6 Hong Kong Government, *Hong Kong Annual Report 1962* (Hong Kong: Government Printer, 1962), p. 212.

7 沈宣仁，〈三十年來情與理——談香港專上學生之社會意識與國事關懷〉，《鄧仕樑主編《崇德日新五十年：崇基演講集》(香港：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，2001年)，頁100。

8 指非法運送人口的犯罪組織主持人。

9 作者佚名，〈難民潮〉，《回顧崇基三十載：校慶特刊》(香港：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，1982年)，頁12；又見林鼎彝，〈戲台拆了，故事依舊〉，《根之茂者：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五十五周年校慶特刊》(香港：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校友會，2006年)，頁44-51。

10 參見Elsie Tu, *Colonial Hong Kong in the Eyes of Elsie Tu* (Hong Kong: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, 2003), Chapter 6, pp.55.



着實籌備，以工作營的方式協助居民解決建屋困難，主要工作包括造地基、築山路、搬運建材等，並投稿報章發動宣傳。

¹¹ 他們的號召得到不少大專學生及社會人士支持和響應，參加者來自多間院校的大專學生，包括香港大學、香港中文大學、浸會、珠海、香江、華僑、廣大、德明、聯大、工專，另有聖約瑟、瑪利諾等中學生，以及外籍學者、院校教授、牧師等共362人次；基督教大專學生公社、世界大專服務會香港分會、世界教會服務會等三個機構亦予精神及物質上的支持；當中亦不乏熱心的社會人士加入同學義務工作的行列。¹²

鑑於工程所築的泥路不太完善，大專同學再組織起來，利用周末及假期為當地居民修築一條長約一千呎的三合土路。由於徙置事務處拒絕資助三千元材料費用，臨時籌委會遂發起建路籌募運動，以「三元一呎」為捐款口號，向大專院校的師生進行募捐。參加的大專同學以體力勞動方式鍛鍊自己，解決困難，這種工作和服務態度，成為了「服務隊」從無到有的精神基石，為日後隊員所稱之「西貢坳精神」；而以「工作是光榮行為」的口號，親身接觸及認識社會，特別是貧苦階層，通過體力勞動為居民服務的方式，更成為



圖一 1963年大專學生為西貢坳居民修築千呎山路。

「服務隊」日後的傳統。1963年12月29日，60多位大專同學在基督教大專學生公社舉行第一次全體大會，正式成立香港大專學生社會服務隊，開展社會服務的工作。

三、「到僻壤去」——「服務隊」的宗旨、目標與組織

60年代初期，香港大專學生對於社會問題普遍被認為是「緘默」的；¹³ 大觀村的遷徙事件激發了大專學生關心社會的意識，學生們自發幫助被迫徙置的居民在西貢坳重建家園，並助修建一條千呎山路，可謂戰後香港學界關注並走進社會的一個里程碑。西貢坳醞釀了一支獨特的服務隊伍，「服務隊」成立的骨幹隊員主要來自港大、中大（崇基學院及新亞書院）、珠

11 一群大專學生，〈救救大觀村被迫遷徙的居民吧！〉，《華僑日報》（香港），1963年9月10日。

12 《香港大專學生社會服務隊》，1964年，頁1-3。

13 〈香港學生運動歷史回顧〉，《學運以外》（香港：出版者不詳，1983年），頁26。

海和浸會等大專學生；經過 1963 年義助迫遷西貢坳居民的行動，隊員建立了一種嚴謹堅毅的服務精神，以及幫助同胞的民族意識。這些來自不同院校熱心社會服務的大專學生，¹⁴ 成立了當時專上學界唯一以社會服務為主體的聯校組織，後更發展成為了一個大專學生認識鄉村、社會和國家的平台。

「服務隊」的隊章建基於西貢坳的服務精神，根據「服務隊」的隊章，其宗旨主要可總括為以下三方面：¹⁵

一) 實現服務社會的崇高理想及負起傳揚「工作是光榮行為」的使命；

二) 鞏固各大專同學之團結友愛關係，維持隊員的團結與統一，以謀求解決社會問題，以及盡力幫助困苦的人士，實現他們的要求；

三) 要求隊員在合理原則下，將隊的利益放在個人利益之上，堅持不懈地努力，把社會建成為幸福的樂園，並在這基礎上繼續努力，實現人類的最高理想。

從上可見隊旨的重心，是團結大專學生的力量，以實際的行動服務社會為依歸。當時曾參與西貢坳徙置事件，並協助

創立「服務隊」的新亞書院生活輔導主任林福孫牧師強調，「服務隊」是為各大專院校有志服務及認識社會的學生而成立，是一個獨立、有延續性，組織緊密的非政治性學生組織。¹⁶ 該隊設有隊旗和隊徽；其組織架構，主要可分為三個層次：全體大會、職員會及顧問。職員會由隊長及副隊長帶領，下設文書組、宣傳組、組織組、財政組及總務組五組。經濟來源主要是靠外界人士及團體捐款、廣告收益、隊員的支持及隊費來維持的。

對於實踐社會服務方面，「服務隊」是有一定的原則和理想的。為物色合適的服務對象，該隊在成立初期，曾聯絡不同的慈善及服務社團，又進行調查研究，經過半年的嘗試，終確定了工作路線和服務對象，認為窮鄉僻壤的村民在物質及精神上都需要幫助，符合社會工作的意義，「到僻壤去」成為主要的服務方向。¹⁷

四、以工作營為核心的發展模式

新界鄉村與離島地區其時皆由理民府管轄，「服務隊」作為一個外界組織，要

14 參加者主要為大專學生，其中入隊者為基本隊員；只參加活動者而未有申請入隊者為非隊員；中學生可申請為「預備隊員」；其他熱心社會服務及支持該隊工作的社會人士，可申請為名譽隊員。參見：香港大專學生社會服務隊隊章 1964。

15 香港大專學生社會服務隊章程 1964

16 資料來源：林福孫北京長途電話訪問記錄，2003年8月30日。按：林福孫牧師於1961年加入新亞書院，1963年9月開始與學生參與西貢坳事件，其後協助籌辦服務隊，1964年為服務隊的顧問。

17 〈三年來的服務隊〉，《香港大專學生社會服務隊年刊》，頁 11-12。

實現到窮鄉僻壤服務的理想，一方面須得到理民府的支持，另一方面亦必要得到村民的認同與接納。該隊在這兩方面的溝通和聯繫，可算是卓有成效。理民府對於「服務隊」往鄉村服務的訴求是予以支持的，除了介紹該隊相關的鄉村建設與服務項目外，更為工作營提供工程所需物資，並時有安排車輛接送工作營參加者。¹⁸ 理民府的支持是促使「服務隊」有效推展工作營不可或缺的因素。

「服務隊」成立後首個工作營於1964年7月在西貢鹽田梓舉行，營期十天，工程為當地居民建造一段456呎之三合土路，以及加高路基以防海水浸入農田。該隊設有一個專責工作營籌備及執行委員會，其組織包括正副主席和書記組，在書記組下再分有財政、聯絡、宣傳、總務、膳食、衛生及技術等七組，此形式成為了日後該隊籌辦工作營的組織藍圖。¹⁹ 由於工作營進展非常順利，除了完成工程以外，參加者還額外為該村修建一條150呎的小路，另外，營中亦舉辦了多項康樂聯誼活動；全營共99人參加，總人次308人。²⁰ 鹽田梓工作營在組織分工及聯繫同學方面均比西貢坳時期進步，其工作組織



圖二 1964年鹽田梓工作營修路工程。



圖三 1964年「服務隊」於鹽田梓所建小路（2006年攝）；
(左下圖) 小路起點今仍保留著刻有建造年份和隊徽的印記。

方式成為了日後「服務隊」舉辦工作營的典範。（參見圖2-3）

繼鹽田梓工作營後，該隊每年在復活節和暑假等長假期間，均舉辦工作營；一般由組織組通過理民府的介紹，到新界相

18 參見1965-1969年服務隊年刊內容；另見隊員梁全先生訪問記錄，2003年8月15日。

19 參見《鹽田仔工作營特刊》(香港：香港大專學生社會服務隊，1964年)，頁4-5。(按：服務隊日後工作營的籌備委員會基本按上述各組組成，惟主席後改為營長，各組織按每次工作營的安排亦稍有不同。)

20 李紹鏗，〈鹽田仔工作營報告〉，《香港大專學生社會服務隊年刊》(香港：香港大專學生社會服務隊，1964年)，頁15-16。



圖四 1964 年流浮山坑口工作營建路工程。



圖五 1966 年 6 月中旬，香港暴雨成災，西環摩星嶺芽菜坑木屋區受災嚴重，「服務隊」組織學生協助村民重建被洪水沖毀的山路。

關的鄉村進行實地調查及訪問，後由職員會決定工作的地點，到鄉間為有需要的村民服務。²¹自1964年起，該隊曾先後於坑口（1964、1971）、田夫仔（1965）、長沙（1965）、塘福（1965）、鯉魚門（1966）、西貢坳（1966）、沙螺灣

（1966）、龍躍頭（1967）、青磚圍（1967）、鹽田仔（1967）、大埔舊墟（1968）、北港（1968）、青山安置區（1968）、九肚村（1968）、貝澳（1969）、長瀝（1969）、蒲台島（1969、1972）、白泥（1970）、貝澳新圍村（1970、1972）、撒頭角村（1971）及大埔基石（1971）等地舉辦工作營。這些工作營的建設項目包括造路、築橋、建下水道、修堤、開闢遊樂場，以至興建碼頭等等。對於「服務隊」的工作，理民府亦予以關注，例如1965年大嶼山長沙、塘福工作營，南約理民府聯絡官和大嶼山南區鄉事會主席曾到場視察工地，水務局工程師曾參加工程的移交儀式；²²反映了當時政府對大專學生義務工作的關注與支持。（參見圖 4-5）

工作營的服務形式並非「服務隊」獨有的產物，在60年代初期，美國公誼服務委員會和香港大學學生會社會服務團亦有類似的活動，只是規模較小而已；1965年社會福利署亦開始策劃首個暑期工作營——「馬灣夏令工作營」，其目的是鼓勵大專學生善用暑假參加社會工作，藉以了解村民生活及充實個人經驗。²³其後，經

²¹ 組織組，〈職員會一年工作報告〉，《香港大專學生社會服務隊年刊》，香港：香港大專學生社會服務隊，1965年），頁5-7。

²² 陳賢忠，〈大嶼山之憶〉，《香港大專學生社會服務隊年刊》，1965；〈香港大專學生社會服務隊昨在長沙塘福完成建橋築路〉，《華僑日報》，1965年7月13日。

²³ 鄭佑安、張傳馨、張振科、黃裕威：〈馬灣夏令工作營〉，《崇基校刊》，第39期（1965年12月），頁15-17。



過1966年4月天星小輪加價觸發起的騷動事件，政府加強了青少年工作，社會福利署青年事務組成立了一個暑期活動籌備組，專責籌辦林林總總的青少年暑期活動；政府所辦的社會服務暑期工作營至1967年增至9個，1968年共12個；²⁴各區理民府亦配合暑期活動，提供鄉村建設工程計劃予有關部門推廣。²⁵由於政府所辦工作營的組織方式與架構，跟「服務隊」所辦之形式非常近似，不少隊員認為「服務隊」的工作營得到了「附和」：

回溯過去的三年，服務隊做過的工作仍然是相當微小，也並不一定給人很大的益處，但可以肯定的是每件工作背後所代表的都是人與人間一種愛的互感；還有一件差堪告慰的事，就是我們的力量雖然微小，但這服務的種子，總算因每一個人的努力，發芽生根，而且產生了影響，得到了附和，我們一直堅守着的體力勞動，香港政府社會福利署及其他團體也都響應我們，辦起工作營來……，我們相信，只要能堅持下去，只要我們的行動真

能證實這工作的價值，一定會得到響應，發生更大的效果。²⁶

誠然，工作營的服務形式並非服務隊專有，但當時以自發方式籌辦工作營，並以體力勞動服務貧苦作主要服務方向的學生組織，則只有「服務隊」；該隊其後設立文化工作隊，增添了文化活動的元素，使其所辦之工作營，無論在性質、組織、形式等方面均與別不同。

五、鄉郊地區的文化工作

在「服務隊」成立初期，除了以體力勞動服務窮鄉僻壤的村民外，更嘗試在鄉郊地區進行不同形式的工作，如在1965年曾助理民府到塔門、較流灣等地進行考察調查，其後更舉辦捐書運動、放電影晚會，以及編印季刊等等，對鄉郊地區的文化工作漸加重視。1966年該隊設立了圖書、歌唱、戲劇、電影及探路五組，醞釀建立一支文化工作隊，到鄉村推廣文化活動。

「服務隊」對文化工作的重視，主要

24 當中亦包括理民府為服務隊提供建築材料的工作營。The organizing committee, "Evaluation report on 1968 summer programmes" (Social Welfare Department, Group & Community Work Division, October, 1968). Source: HKRS 70-1-365, Summer Youth Activities, Public Records Office of Hong Kong.

25 "Plan of summer programmes for youth and children at Yuen Long 1969". Source: HKRS 70-1-366 (2), Summer Youth Activities, 1969, Public Records Office of Hong Kong.

26 書記組，〈三年來的服務隊〉，《香港大專學生社會服務隊年刊》(香港：香港大專學生社會服務隊，1966年)，頁10-11。

是建基於該隊兩年來對鄉郊地區的接觸與認識，以及在工作過程中對服務概念的摸索。在 1966 年《大路》年刊〈文化工作〉一文清楚交代了該隊以文化工作為重點的理念：

三年來，隊一直在體力勞動方面貫徹服務社會和聯絡同學的宗旨，可是在工作的過程中，我們漸漸觀察和感受到，對於那些被遺忘在窮鄉僻壤的人們，一條溝通心靈的道路，實在比短短一條小石路更為急需；而且隨著隊的擴展，我們發覺，要提高隊員的質素，必須要建立起正確的服務意識，培養出愛心和善意；基於上述兩個需求，一個直指靈魂深處的隊伍——「文化工作小隊」，就這樣武裝起來。²⁷

文化工作隊的產生，代表了「服務隊」對「窮鄉僻壤」這個服務對象和範圍的肯定，以及進一步在鄉郊地區的服務的決心；從提供健康的娛樂與文化活動，例如捐贈圖書、教歌唱、演戲劇和放電影等

等，展開精神層面的服務與教育工作，以期改善村民的生活素質。

文化工作隊中的「圖書組」，負責籌辦捐書運動、捐送圖書予偏遠貧窮的鄉村，以及在工作營期間設立臨時圖書室；1966 年創辦初期共收圖書近 16000 本，²⁸並將圖書發送至多個鄉村和團體，活動頗見規模。

「歌唱組」成立目的是為了透過歌唱聯絡各大專同學，並把歌聲作為文化一部份帶到鄉村去；²⁹ 1966 年 8 月出版了《服務歌集》，³⁰ 主要收入了一些鄉間民謠，還有不少中國傳統民歌，例如「黃河頌」、「長城謠」、「畢業歌」、「嘉陵江上」等，更有改編自「游擊隊歌」的「我們就是服務隊」，在當時學界是頗新穎的意念，反映了該隊隊員愛國的情懷。

「戲劇組」是運用戲劇的方式推動文化工作，所演戲劇著重反映社會和鄉間的問題，寓教育於娛樂；劇本皆由組員自行編導，藉以讓同學更加了解社會問題與鄉村的生活，曾編有《謠傳》、《沽名釣譽》和《污糟貓》等等。³¹

「電影組」的目的是「將電影帶到農村

27 文化工作小隊，〈文化工作〉，《香港大專學生社會服務隊年刊》(香港：香港大專學生社會服務隊，1966年)，頁16。

28 文化工作小隊，〈文化工作〉，頁18。

29 《文化工作小隊》(香港：香港大專學生社會服務隊，1968年)，頁9-11。

30 服務隊出版的歌集共有4本，其餘3本分別於1967、1968及1971年出版。

31 這些劇本多為喜劇，這與適應村民的喜好與鄉村的環境相關。參見：文化工作小隊，〈文化工作〉，頁18。

去」；³²活動所需的放影機、擴音器等器材及影片，主要從美國新聞處借回來，放映的影片多為益智卡通或具教育意義的影片，如1965年塔門電影晚會放映的《寶貴的糧食（花生）》、《童子軍》、《最寶貴的財產（身體）》、《鄉村與學校》、《疾病的媒介》等等。³³

「探路組」主要是通過往鄉郊地區探路，為該隊收集相關的鄉村資料，以便選擇工作營的地點及進行活動籌備工作。例如，1966年該隊首次往東涌放電影，事前先派員訪問該村，了解村民的生活情況，並收集村民對放電影的意見，以作籌劃活動的參考資料。³⁴此外，探路亦有聯絡隊員感情，增加同學對鄉郊地區認識的作用。為了配合各項的調查活動，1966年該隊以油印方式編製了三期有關調查研究方法的特刊，另有一期「調查研究的綜合本」。探路隊以遠足旅行或探訪的方式進行探查的工作，所到處包括市郊、農村，以至市內的貧苦地區，不少路線是隊員從未到過的。從年刊及月刊《大路》資料所見，探路不單對籌備工作營或其他活

動有顯著成效，且成為隊員親身探查及體察鄉民生活面貌，以及發掘和解決鄉村問題的途徑，活動價值在隊內得到肯定。³⁵基於探路組與上述四組性質不同，故後從文化工作隊分拆出來，獨立發展為該隊一項重要活動。在1966至1972年間，該隊曾往40多個鄉郊和貧苦地區進行探路工作。探路工作在「服務隊」中一直持續，70年代初期隨該隊將工作重點轉回市區；對於此時期的隊員，探路是為了「走進城市，訪貧問苦，希望可以為貧困的人做一點事，出一點力。縱力有不逮，亦希望儘量幫助別人，教育自己」。³⁶

60年代中期，「服務隊」在鄉村地區推廣文化活動，服務方式已漸見規模；1966年在沙螺灣舉行的兩期工作營，更是首次結合了文化工作與勞動服務兩種服務元素。是次營期共34天，目的是將沙螺灣原有長180呎，高10呎，闊8呎的碼頭加高1呎，以避免潮漲時被潮水淹沒。工作營參加總人次為1445人，是眾多工作營中，工作日數最長及最多參與者的，³⁷無論在籌辦的方式、營期、參加人數方

32 〈把電影帶到農村去〉，《大路》，第1期，（香港：香港大專學生社會服務隊，1966年2月），頁19-21。

33 文化工作小隊，〈文化工作〉，頁16-21。

34 訪問組，〈東涌訪問報告〉，《大路》，1966年2月，第1期，頁4-9。

35 仙楓，〈探路去〉，《大路》，第11號（香港：香港大專學生社會服務隊，1967年2月），頁22-23。

36 譚燕，〈看隊的探路〉，《香港大專學生社會服務隊年刊》（香港：香港大專學生社會服務隊，1971年），頁49。

37 〈沙螺灣工作營報告〉，《香港大專學生社會服務隊年刊》（香港：香港大專學生社會服務隊，1966年），頁24-27。

面，均是自鹽田梓工作營後另一個典範；而寓文化工作與體力勞動於一體的工作營，亦成為了該隊獨有的特色。1967年正式成立「文化工作隊」後，該隊整個體系已形成，服務對象及工作形式亦有了明確的定位，可說是該隊從成立到發展期的一個重要標誌。（參見圖6-10）



圖六 1966年沙螺灣工作營運輸組搬運物資。



圖七 1966年沙螺灣工作營木模組於水退時的工作情況。



圖八 1967年《大路》年刊及《服務歌集》。
(年刊封面圖片：1967年「服務隊」為
鹽田梓村修建連接澤西洲的防波堤。)



圖九 1966年文化工作隊在塔門天后廟前準備放電影。



圖十 1970年流浮山白泥工作營，文化工作隊
放電影時的活動情景。



六、《大路》——「服務隊」的主要宣傳刊物

「服務隊」自成立初年，主要的定期刊物為《香港大專學生社會服務隊年刊》。年刊主要為每年活動的總結與回顧，內有活動和財政報告、顧問名單、參加者投稿文章等等。1965年後期，該隊出版第一期季刊《隊風》；1966年2月由油印方式刊行的月刊《大路》取替；同年，「服務隊」的年刊亦易名為《大路》。

《隊風》及《大路》均為職員會宣傳組編印的刊物，目的均為隊員間溝通，報導該隊的活動及計劃，兩者不同之處尤見於以「大路」定名的動機。1966年「服務隊」新設有文化工作小組，加強服務工作與範圍；「大路」的命名一方面反映了該隊以體力勞動為窮鄉僻壤修橋築路的傳統，另一方面亦表達了他們到鄉間修橋築路背後的理念與社會責任感，既強調了「服務隊」的精神特質，亦標誌着該隊已定明了工作目標與發展路向：

路是我們開的，服務隊要開墾的是一

條大路，一條能與社會上所有人共同並肩馳騁的大路，這條由我們雙手墾拓出來的大路，帶引著人們通到應到的地方，所以我們隊的刊物就叫「大路」。³⁸

《大路》的立場是「超於一切宗教政治及其他背景的約束，直接給香港社會上需要幫助的人們服務」，³⁹自1966年2月出版至1972年9月，共刊有65期；早期用鋼筆在蠟紙上刻劃，以油印的形式付印，並無固定頁數，內容主要有參加者對鄉村服務的體驗與分享，還有對該隊及社會問題的探討。

1970年第42期開始，《大路》改用鉛印方式出版，初期印式為4版，每期1000份，後於1971年改至6版，每期出版增至1500份。此時期《大路》的對象已不只限於隊員本身，各大專院校學生和在職青年均為其對象讀者，另亦有寄予社團、圖書館、文社及海外隊友。⁴⁰改版後《大路》的風格明顯轉變，新訂定的立場以「從維護普羅大眾的利益出發」，⁴¹內容不單以認識「服務隊」為核心，更透過對香港及中國社會問題的研討，使同學關心社

38 〈編者的話〉，《大路》，第1期（香港：香港大專學生社會服務隊，1966年2月），頁25。

39 〈編者的話〉，《大路》，第2期（香港：香港大專學生社會服務隊，1966年3月），頁38。

40 宣傳組，〈職員會年報〉，《香港大專學生社會服務隊年刊》（香港：香港大專學生社會服務隊，1971年），頁9-10。

41 宣傳組：〈職員會年報〉，《香港大專學生社會服務隊年刊》（香港：香港大專學生社會服務隊，1970年），頁10-11。

會，提高民族感情及意識。1972年《大路》共設有6個專欄，包括國際時事、本港時事、我們的生活、小品文、隊活動報告和近代史。此外，《大路》月刊間有以個別時事或研究主題作為專號，如1970年11月及1971年4月分別編印了兩期《釣魚台專號》、1972年3月有《中國河流點滴》。該隊更曾就一些社會問題及事件出版特刊公開派發，例如1970年11月出版20,000份《隧道工潮特刊》；1971年10月與各大專院校及相關團體出版了40,000份《盲人工潮聯合特刊》。從出版刊物內容的調整，可窺見「服務隊」關注點的轉變；70年代初《大路》的內容明顯較貼近社會時事，反映隊員關注點已從昔日的鄉村服務漸轉到社會中心。

七、從鄉村回到城市——「服務隊」的解散

「服務隊」作為一個關注社會的服務組織，自成立以來，除了在鄉間舉辦工作營及文化活動外，還參與其他的社會工作，並為隊員舉辦訓練和研討活動等。在1964年至1972年間，該隊曾舉辦活動186項，當中大致可分為10個項目：工作營、救災行動、文化工作、探路、調查研究、生活營、研討會與座談會、歌唱晚會及聯誼活動、社會事件及其他；這10種活動如按其性質，大致可歸納為以下5個

範疇：

1. 體力勞動及社會接觸——工作營、探路及調查研究
透過體力勞動，以實際行動幫助有需要的人士，並親身走到貧苦地區或鄉村進行研究調查，藉以了解社會情況。
2. 文化工作
透過捐書運動為偏遠或貧苦鄉村帶送圖書，另有放電影、戲劇及歌唱組，以期將文化知識帶到鄉村去。
3. 思想探討——討論會、生活營及座談會
加強同學對世界、民族及社會問題的認知，以及對隊內問題的探討。
4. 突發社會事件——救災行動及社會事件
對自然災害或社會問題的回應，如救助受災居民；參與社會事件的行動，如隧道工潮與盲人工潮等。
5. 內部活動——歌唱晚會及聯誼活動
此類別的活動多為隊內的聯誼活動，如聯誼晚會及旅行，以團結隊員，亦有為特別事件舉辦的內部活動，如「七七紀念歌唱晚會」。

在60年代後期，鄉郊村民生活逐步改善，電視機開始普及，加上政府和社團為青少年舉辦工作營活動增多，「服務隊」在選擇合適和有實際意義的工作營上遇到了一定的困難，隊員開始檢討工作營



的服務方向。同時，自 1966 年起，香港和中國社會都起了急劇變化，香港兩次的社會動盪、中國的文化大革命等，均對社會、政治及民族的意識造成影響，大專學生亦開始注視身處的環境及社會中的問題，學界漸變活躍。向以服務社會及民族意識為發展導向的「服務隊」，雖沒有參加有關事件，但在社會環境整體的影響下，亦開始探討政治立場等問題。1968 年 9 月，該隊開始對社會問題作出回應，在報章發表聲明，反對新界鄉議局開辦賭狗場一事，並呼籲其他大專學生團體聯合呼應。⁴² 這是該隊自西貢坳事件以來，第一次對社會事件發表聲明，表明立場。自此，該隊採取了緊貼社會的態度，留意及支援社會上發生的事件，先後對 1969 年珠海學生被開除事件作回應，1970 年起更聯同 16 個社團舉行了一個中文成為法定語文的公開座談會、支持海底隧道工人罷工事件、盲人工潮，以及秀茂坪雞寮六一八天災協助救災工作等等，踏入了轉型階段。

對於在鄉郊地區舉辦工作營的意義和

成效，隊內曾作多次討論；《大路》亦載有不少有關隊內問題，如隊員數目下降等的檢討報告，以至非隊員評價該隊的短文。⁴³ 直至 70 年代，該隊在工作方向上有了一新的共識，認為「體力勞動只是改造自己的最初步，鄉村文化活動對教育自己及改善社會都是膚淺而不澈底的」。⁴⁴ 在這階段，「服務隊」雖仍保持舉辦工作營的傳統，但工作重心已由鄉村轉回市區，從社會服務轉移至社會事件參與方面，活動重心以思想性為主。對文工隊活動，作出大幅刪減或調整，後只維持了探路工作，重點是通過親身調查及訪問，加深對社會本質的認識，故查訪的多為鄉村設施及福利等問題。然而，部分隊員在探路過程中，開始了解到隊在解決社會問題方面的能力限制，理想與現實的距離，對探路的工作意義產生疑惑。⁴⁵

「服務隊」在轉型過程中未能找到新的突破。一些積極參與社會事件的大專團體認為「服務隊」落伍，未能擺脫固有的工作營服務形式；另一方面，基於「服務隊」一向強調民族意識，又參與社會事

42 參見〈隊的嚴正聲明〉，《香港大專學生社會服務隊年刊》(香港：香港大專學生社會服務隊，1968 年)，頁 14。

43 非隊員，〈我不加入服務隊？〉，《大路》第 11 號 (香港：香港大專學生社會服務隊，1967 年 2 月)，頁 11-13。

44 〈職員會年報〉，《香港大專學生社會服務隊年刊》(香港：香港大專學生社會服務隊，1971 年)，頁 5-6。

45 譚燕，〈看隊的探路〉，《香港大專學生社會服務隊年刊》1971 年，頁 49；譚燕，〈工作營探路〉，《大路》第 63 期 (香港：香港大專學生社會服務隊，1972 年 7 月)，第三版。

件，且常有對政治路線及問題的討論，故部分大專學生視該隊為是一個激進團體。

香港專上學生聯會所編的學運史中，曾簡述了當時外界人士或團體對「服務隊」的不同評價：

由於「服務隊」形式與中共的勞動改造有所相同，被人視為左傾；但又被左派人士視為「改良主義」。而服務隊則避免投入任何政治勢力，對暴動一事不予觸及，但部分參與同學的思想仍受到衝擊，對於「服務隊」是否改變當時的政治形象曾有爭論，但終於「保守」地在 67 至 69 年間維持原來的活動形式。⁴⁶

活動的場所，成為了該隊延續的另一模式。

八、知青到鄉間——「服務隊」在鄉郊地區的活動與發展

「服務隊」以窮鄉僻壤的村民作為服務對象，以工作營為核心的服務方式，使其與鄉村建立了密不可分的關係，而鄉郊地區亦成為了該隊的在成立至發展期間主要的活動中心；後隨着社會的轉變，該隊不再以工作營為活動核心，改而參與社會事件，惜未能成功從鄉村服務中轉型蛻變，在學界火紅年代開始之際淡然解散。從「服務隊」成立至解散 9 年間，該隊曾走訪及服務逾 50 鄉村和偏遠貧苦的地區，近似當時中國的知識青年，上山下鄉到偏遠的農村鄉郊去學習和服務，是時代特有的產物，其歷史意義，以及在鄉村研究的價值，值得學界關注。

近年，中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歷史已成為學界的一個熱門研究課題，國內與海外相繼有不少論文和專著，從不同角度探討和評價這段歷史。這些研究普遍將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歷史分為最少三個階段，其中 60 年代開始的上山下鄉運動，實與當時城市精簡人口，以及紓解青年升

46 〈衝破沉默——學運的醞釀期：(2) 香港大專學生社會服務隊之成立、成長〉，香港專上學生聯會編，《香港學生運動回顧》(香港：廣角鏡出版社，1983年)，頁12。

47 香港大專學生社會服務隊：〈第九屆全年大會會議記錄〉，1973年1月14日。



學及就業問題的政策息息相關。⁴⁸由60年代初至運動結束，總計有近1700萬初中、高中以至大學畢業生，響應國家號召，上山下鄉，落戶農村，進行學習和建設工作；這股大潮並未有在當時仍屬殖民地的香港社會產生巨大的迴響，惟有主力往窮鄉僻壤工作的「服務隊」，其服務形式被視為香港知識青年仿模上山下鄉的行動。

「服務隊」的活動地區、工作形式與組織，包含了國內上山下鄉的知青影子，然而，其體力勞動的精神、社會和民族意識是自該隊成立已有的一個重要特質，這種服務與思想方式的形成，與當時香港的大專學生對社會和國家問題的回應與探討，有着密切的關係。在香港殖民社地會少有鼓勵學生談論政治與國家民族，少有教唱中國傳統民族歌曲的情況下，隊員製作一本富中國民族意味的歌集，在當時學界殊為罕見。筆者在訪問中得悉，不少隊員和大專同學是在參加「服務隊」的活動中初次接觸及學會唱中國民歌。然而，「服務隊」強調民族意識的表現，卻沒有與政治掛鉤，據訪問資料所得，隊旗與第

一部《服務歌集》均選取藍色，以及在歌集中修改帶有政治色彩的歌詞，顯示該隊是沒有政治目的；歌集收錄中國民歌的原因，亦只建基於民族意識：

許多人認為「狹窄」的民族意識似已不合時宜，但祇要一日白澳洲、白南非政策還存在，……祇要現今的生產關係還未能消滅民族的對立，我們毫不會放棄我們一向的民族意識。……我們希望那澎湃的民族意識，能充實隊每項活動……只要富有民族色彩，便值得高歌，又何須計較其政治背景。⁴⁹

與其他院校團體不同之處，「服務隊」是一個獨立的聯校學生組織，加上其非政治組織的立場，招徠了不少不同背景、不同理念、關心和熱心服務社會的大專同學參加。該隊的非政治立場，容納了不同立場與意見的參加者，部份關心社會的隊員，更在課餘期間自組讀書會，討論及學習中國哲學與近代史等，該隊漸凝聚了討論及探討問題的風氣，這種特質可見於該隊舉辦的討論會、生活營及座談會，以及

48 第一階段約在1955至1961年間、第二階段由1962-66年、第三階段為文革開始後至1979年知青運動結束。參見：杜鴻林，《風潮蕩落——中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史(1955-1979)》(深圳：海天出版社，1993年)、顧洪章主編，《中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始末》(北京：中國檢察出版社，1996年)；顧洪章主編，《中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大事記》(北京：中國檢察出版社，1996年)、定宜庄，《中國知青史——初瀾(1953-1968)》(北京：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，1998年)、劉小萌，《中國知青史——大潮(1966-1980)》(北京：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，1998年)、朱政惠與金光耀主編，《知青部落》(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4年)等著。

49 〈善的家〉，《香港大專學生社會服務隊年刊》，1967年，頁23。

《大路》的文章之中。在 60 年代中期，對不少隊員來說，工作營除了以往刻苦及自我鍛鍊的精神，更著重社會意識的覺醒：

義務性質的工作營，它的功用在讓大家有一個機會，把自己的思想與精神，從當下當地的小圈子中解脫出來！……也正是這種「解脫」才能使這裡的大學青年，轉而注意香港、中國以及世界的存在，並且進一步想到他自己和此三者的關係，他自己在這三個層次上應有的義務、努力的方向和內容！⁵⁰

「服務隊」的形成與本質，與國內知青上山下鄉的情況雖不盡相同，但前者近似後者之處，卻又可見於時、地、人三方面。「服務隊」成立於 60 年代初期上山下鄉運動再度蓬勃之時，而參加者「知識青年」的身份，以及其以鄉郊地區為本的活動對象與範圍，皆與國內知青上山下鄉的情況相符。60 年代中期該隊成立「文化工作隊」後，其結合勞動工作與文化活動的工作形式，《大路》刊物的命名，與「上

山下鄉」的「下鄉」的模式更形近似，以至被報章認為是左傾組織，而該隊非政治的立場卻又被左派報章批評指「隊正走上一妥協性路線，抹煞階級鬥爭和仇恨」。⁵¹ 60 年代，香港鄉村地區提供了一個獨有的夾縫空間，使「服務隊」得以成長。

如果從「服務隊」所建項目的數量來衡量其貢獻，結果一定是微不足道的。基於學生的人力與財力的限制，每年只能在長假期舉辦的工作營，這些建設雖有助改善村民的生活，然而，隨着鄉郊地區的發展、土地使用的改變，昔日所修建的橋、路及碼頭等，不少已被拆掉、荒廢或改變用途，其作用只是短暫的。在非物質的層面，「服務隊」對窮鄉僻壤及貧苦人士的關注、著重體力勞動的服務方式，以及在 1965 年底至 1969 年間在鄉村推動的文化工作，則是 60 年代香港社會非常罕有的現象。「服務隊」成立初期，曾被認為是香港大專學生「最早社會意識的覺醒」⁵²，並被視為「當時校外學生組織中最蓬勃而有前途的一支」；⁵³ 在眾多的學生社會服務項目中，學界和不少報章對「服務隊」

50 李樹章，〈怎麼看待工作營——從香港大學生說起〉，葉佩華主編《記取風華正茂：崇基學院五十年來學生文選》（香港：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，2001 年），頁 236-238 頁；轉錄自《崇基學生雙週報》，1968 年 2 月 23 日。

51 〈六十大板——隊的政治立場〉，《香港大專學生社會服務隊年刊》（香港：香港大專學生社會服務隊，1967 年），頁 36。

52 參見：沈宣仁，〈三十年來情與理——談香港專上學生之社會意識與國事關懷〉，頁 99-104。

53 其他校外活動組織有港九大專同學會、天主教大專聯會、世界大學服務會、大學生活社和大專公社等；參見：〈近年來本港大專學生的活動〉，《大學生活》，1966 年 5 月，頁 27-29。



的捐書運動及工作營的評論都是予以肯定的。⁵⁴

在 60 年代偏遠鄉村地區的資源尚為匱乏之際，「服務隊」的出現曾為鄉郊地區的人們帶來物質與精神上的一點慰藉。筆者曾往部分「服務隊」舉辦工作營的鄉村探訪，大部分村民仍記起該隊在村內的工作與活動；年前一些昔日「服務隊」隊員路經沙螺灣，更獲當地村民邀請參加新年聚會，而當年曾協助服務隊員修築海堤的村童，當中亦有受隊員影響而升讀大學者。⁵⁵然而，據初步調查資料所得，村民對「服務隊」印象主要在於該隊在當地的物質服務；與國內分派往固定地區工作的知青，又或是進村傳教的傳教士相比，「服務隊」未有以固定鄉村地區作為發展根據地，故該隊雖走遍新界及偏遠地區的多個鄉村，但其影響只能維持在「過客」層面。

反之，窮鄉僻壤是孕育「服務隊」的土壤，為該隊參加者提供了一個試練場，一個非傳統的學習、自我鍛鍊、交流和服務社會的機會，還有探索和認識社會的空

間。綜合「服務隊」的記錄、刊物，以及筆者與近 50 隊員聯絡、25 位隊員訪問的資料，無論那一個時期加入「服務隊」的隊員，都認為隊是一個有意義的組織。⁵⁶「服務隊」走進了鄉村，他們雖沒有國內知青下鄉向農民學習的出發點，且更希望通過文化工作將知識送到窮鄉僻壤去，但是從資料分析所見，該隊與鄉村兩者間實存在雙向影響的關係，在此受者對施者影響更為深遠，窮鄉僻壤成為「服務隊」發展的重要空間。

九、總結

「服務隊」自 1963 年成立起，與本地鄉郊地區結下不解之緣；自 1964 年鹽田梓工作營以來，該隊曾為 20 多條鄉村修橋、築路、建碼頭和補海堤，另達逾 50 多個鄉郊地區推廣文化工作；其著重體力勞體的工作方式，以及強調民族與社會意識的特質，曾為社會所關注，乃 60 年代香港唯一一個以窮鄉僻壤為服務基本的學生組織。《大路》的命名就是「服務隊」的

54 參見：〈香港大專學生社會服務隊昨在長沙塘福完成建橋築路〉，《華僑日報》，1965年7月13日；〈由本港大專學生替貧民服務談起〉，《香港時報》，1963年9月14日；〈香港大專學生社會服務隊昨在長沙塘福完成建橋築路〉，《華僑日報》，1965年7月13日；社論〈發揚公民精神〉，《星島日報》，1965年9月13日；〈一支生力軍！論本港大專學生社會服務隊〉，《快報》，第2版，1966年7月11日；張正平，《香港學生運動》（香港：大學生活出版社，1970年），頁83等。

55 辛翠時，〈村童成教授〉，《星島日報》，2007年3月19日。

56 此觀感只能代表該隊的隊員，並未包括短期的參加者或其他大專學生。按：「服務隊」每年參加活動者逾百，間達千人，核心的隊員則每年維持在約近 50 人左右。

自我定位和理想的體現，期望在窮鄉僻壤開墾「一條能與社會上所有人共同並肩馳騁的大路……帶引着人們通到應到的地方」。⁵⁷雖然，在現實上，他們努力的成果，只是一些鄉間「小路」，而且在經歷了時代的風吹雨打之後，這些小路也日漸被人遺忘，但是，「服務隊」的建設卻是60至70年代初香港大專學生開始關心社會的表現，以實際行動服務社會的一個時代印記。

「服務隊」的歷史與鄉村地區有着密不可分的關係，然而，該隊只屬這些地區的外來者，其短暫的史跡只觸及鄉村的邊緣，故一直未被本地人類學、歷史學和社會學界關注。本文利用了「服務隊」現存的文獻資料，配合口述歷史及田野考察記錄，嘗試重塑60至70年代初在鄉村及貧苦地區曇花一現的現象，藉以了解被遺忘的「服務隊」的面貌。

⁵⁷ 〈編者的話〉，《大路》，第1期，頁25。